

信仰的失落和重建

□史春燕 [苏州大学 江苏 215123]

[摘要] 信仰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为人类提供了追求价值的动力和目标,具有一种精神家园的意义。历史上,信仰与理性由“对立”到“统一”再到“分离”,到现代社会,由于过于强调理性,而忽视了信仰的作用,导致信仰失落,人类失去精神家园。如何重建信仰是当代人急需解决的难题。马克思主义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和最高价值理想,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信仰,为人类找到了新的精神家园和信仰的栖息地。

[关键词] 信仰; 理性; 失落; 重建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1)06-0096-03

信仰的最一般含义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并以之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界对信仰的定义是指:信仰是指特定社会文化群体和生活于该社群文化条件下的个体,基于一种共同价值目标期待之基础上,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其理想目的性;二是其意志承诺的坚定性和持久性;三是其执著唯一性或排他性^[1]。信仰作为人对价值理想的选择,其形式有多种多样,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会有不同的信仰,有政治信仰、科学信仰、道德信仰、宗教信仰等等。其中宗教信仰是很重要的一种信仰。在西方,宗教几乎是信仰的代名词,事实上也确已形成了西方人血脉相通的“人的精神自由”的宗教传统。

宗教信仰虽是非理性的情感表现,但并不是说宗教信仰始终是非理性的甚至是盲目的。信仰主体对信仰对象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来确定的,即使选择的结果可能是荒谬的,也不可否认选择是一个理性思维的过程。所以宗教信仰与理性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

信仰和理性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构成要素,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信仰与理性的碰撞,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是理性辩护主义,利用希腊哲学为基督教教义辩护;另一是反对理性的信仰主义,就是把基督教信仰与希腊人

的理性完全对立起来。第二次是信仰与理性的统一,此时期的观点是信仰的教义来自于启示而非理性,但信仰与理性并不相互排斥,基督教的教义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来论证或证明。第三次是信仰与理性的分离,主要观点是力图把理性从宗教中排斥出去,可结果却是恢复了宗教的纯洁,也削弱了宗教的信仰。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征服,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理性不再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家园,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心灵慰藉。此时,基督教以它唯灵主义的理想和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走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人们的关注,给处于精神危机的世界带来了新的人生意义,为那些梦想破灭的人展示出新的希望,为精神破灭的希腊罗马世界提供了一种理想生活的理论,从此基督教信仰取代理性世界观占据了思想的主导地位。但基督教并没有完全排斥理性,而是把希伯来的文化传统和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融为一体。认为,希腊哲学知识能够给予基督教信仰以合乎逻辑的解释,能够理智地批驳异教徒对基督教教义的责难。由于采用了希腊哲学的语言和范畴,基督教学者得以用理性术语解释神谕和上帝的存在,从而将基督教教义从单纯的信仰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

作为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摒弃了古典人文主义关于理性独立的根本精神,主张理性必须以信仰为向导。没有信仰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和理解,但他也肯定了理性的力量,坚持

[收稿日期] 2011-06-06

[作者简介] 史春燕(1971-)女,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在读博士生。

利用理性哲学为基督教服务,提出“信仰寻求理解”。随后的“经院哲学之父”安瑟尔谟也认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他把辩证法应用于当时的神学家认为理性无法理解的神秘领域,特别是上帝存在、三位一体、基督的肉身和赎罪、命运与意志自由等问题。他相信,理性可以达到与《圣经》和教父教导相符合的结论,“我们信仰所坚持的与被必然理性所证明的是同等的”^[2]。自此,理性主义不再是基础和目的,而是方法和工具,信仰则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理性是为信仰服务的,希腊哲学开始一步步沦为神学的婢女。

中世纪基督教鼎盛时期,信仰和理性实现了统一。托马斯·阿奎那依然坚信信仰至上,但他对二者的关系赋予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哲学与神学是两门不同的科学,但不是绝对对立,哲学和神学是达到同一真理即上帝的两条不同的知识途径或者两个不同的环节,哲学靠理性认识上帝,神学靠天启认识上帝,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学和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永远不会发生矛盾。

随着中世纪基督教鼎盛时期的过去,信仰与理性由统一走向分离。在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上,司各脱提出了“上帝不是形而上学的主题”的新主张。他认为人的理智属于有限存在,上帝的理智属于无限存在,两者有着不同的属性,不能相通,上帝不是人类理智认识的对象,而是信仰和爱的对象,如果用理性去思考无限存在的问题,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司各脱为哲学和神学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他试图限制理性为信仰保留地盘,但却在客观上弱化了神学的地位,开启了理性独立之路的思想历程。

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自然科学精神的诞生,标志着世俗文化向神学文化发起了挑战,新的精神追求开始冲击着中世纪传统价值体系。而真正突破基督教权威,确立理性统治地位,则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知识就是力量”表达的是一种人类理性真理观,同时也确立了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科学理性和知识取代了对一切超越理性的力量或对象的价值信仰,康德称这种由宗教文化信仰向知识真理信念的转变是“哥白尼式革命”。康德明确主张把知识与信仰区分开来,他认为理性既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感叹到:康德用理性杀死了上帝。尼采在20世纪的前夜,大声宣布“上帝死了”,也宣告了西方信仰的失落。

信仰失落又称为双重性的信仰危机,即信仰失

真和信仰贬值,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双重性危机,其基本表现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分离、失衡。在科学方面,一是由于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被以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似乎被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因素所干扰,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给人类带来福利,也带来了灾难,科学真理和科学价值因而丧失了信仰的高度。在人文方面,理想主义的受挫,神圣的人文信仰因而丧失了真理依据,实用、功利主义在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精神痛苦、精神空虚,世俗的人文信仰丧失了价值依据^[3]。

信仰的失落,人变成了无根的浮萍,表面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为所欲为,成为一切。海德格尔说:人(此在)被抛入可能性的境域之中,“可能性”意味着自由,而“被抛”则意味着限制和不自由。其含义是,人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自由的存在,人是被迫自由的,看起来自相矛盾,实际上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内在矛盾。海德格尔将逃避自由称为“此在”(人的存在)的“沉沦”。萨特认为自由是人无可奈何不得不承担的命运,人不得自由,不得不由他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即使是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为你选择了不选择。

人在“价值”的颠覆中杀死了上帝,紧接着又在“存在”的毁灭中杀死了人自身^[4]。

上帝隐退,他可以像旁观者一样,坐在天国静观人间的百态,不必去承担任何责任。而抛弃信仰的人类,只能独自品尝自酿的苦果。“上帝死了,精神家园也没有了。”萨特说“没有上帝是一件麻烦的事。”海德格尔也认为,否定上帝会使西方社会进入一个无根基、无依托的时代。

尼采之后,基督教文化的最高价值和意义不断贬损而沦为虚无主义,意义大块剥落,……人们在哲学的殿堂翻倒了形而上学的一切牢不可破的根基,现在,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中到处都是无中心、无意义的回声。西方的荒诞,中国的无聊,人类不能没有信仰。信仰对于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性一旦被否定,心灵就失去根基、人生就失去目标。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如果只有物质崇拜而没有精神信仰,就会出问题。

信仰意味着责任、义务和敬畏之心。与有信仰的人相比,没有信仰的人缺乏道德责任感,这种人做什么都不再受拘束,也不再有所畏惧。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怕时,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最可怕的人。当人拥有信仰时,人生就有了安心立命之所。信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而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有信仰

的人就成为“具有内在性的人”(克尔凯郭尔语),有内在性意味着生命的厚重与质感和心灵的成熟与沉稳。诗人歌德曾说:“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伴随着精神意义的丧失,这一切构成了现代人的困境。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和尊严又在哪里?这一切都成了现代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科学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人类的生存不能没有信仰,否则,必然招致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在今天,随着宗教的日益边缘化,重新回归宗教并不一定能解决人类的精神困境,因而重建信仰不是重建宗教,而是重建一种文化价值理想。

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揭露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种种问题产生的根源,主张建立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这一崇高的价值理想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马克思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对未来的预设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描述,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既不是某种“绝对精神”,也不是一种主观设定,更非虚无缥

缈的承诺,它摒弃了在理想信仰问题上的神秘性和盲目性,树立了唯物主义的理想信仰,为人类预测了一种合理的社会发展图景和描绘了人类美好生活的未来,并为此提供了更可信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和最高价值理想,充分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终极关怀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各种信仰的不同之处,“将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信仰建构在人的现实活动的基础之上,在形而上与形而下、超经验与经验的双向层面上为人类指明了一条通往‘天国’的现实路径,为人类找到了新的精神家园和信仰的栖息地。”^[6]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正如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

参考文献

- [1] 万俊人. 信仰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及其文化解释[J]. 清华大学学报, 2001, (1): 22-29.
- [2]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20.
- [3] 黄慧珍. 信仰及其危机和转机——从真理和价值的视角看[J]. 哲学动态, 2002, (12): 20-23.
- [4] 李朝东. 意志自由与责任承担[J]. 西北师大学报, 2002, (4): 1-6.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94.
- [6] 胡伟文. 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的超越及其哲学信仰的重构[J]. 甘肃社会科学, 2008, (2): 43-46.

Belief Lost and Reconstruction

SHI Chun-ya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As one way of human being's spiritual life, belief has provided human being with impetus and target to pursue values. Histor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lief and rationality evolves from “opposition” to “unity” to “separation”. Until the modern society, since the rationality is excessively emphasized, the belief is neglected, which leads to a belief lost. How to rebuild belief is a difficult problem for us. Marxism takes the realization of mankind's liberation and human's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s the fundamental values and the highest values and ideals, which find a new spiritual habitat for human being.

Key words belief; rationality; lost; reconstruction

编辑 刘波